

1990年高中毕业时，拉片最初报考的是西医，但后来被录取到了西藏自治区藏医学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藏医医生大多数为僧人或是男性，很少有女性行医。如今，在西藏各地的藏医院里，都有像拉片一样的女藏医。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藏医藏药事业中，她们当中有藏医药女硕士、女博士及博士后。

新华社记者多吉占堆、薛文献、白少波

“小姑娘你哪里不舒服？慢慢说，不着急。”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妇产科诊室里，45岁的女藏医拉片戴着口罩，身着白大褂，一边询问病人的情况，一边在电脑上写下医嘱，旁边还坐着一位年轻医生，在纸上记录着。

“这是常见的痛经，我给你开点藏药，分别在早上和晚上吃。”拉片叮嘱病人的母亲，“记得提醒孩子，经期要注意保暖，不要吃刺激性食物。”

见证了新时期藏医妇产科的发展与变迁

作为妇产科副主任，拉片长期在临床一线坐诊，为病人诊断开方。整洁的休息区里，候诊群众座无虚席。“遇上科里有手术，即便是轮班休息，我也必须随叫随到。”

藏医药有3800多年历史。今年是西藏自治区藏医院成立100周年，其前身为“门孜康”（藏医星算学院）。作为一名女藏医，拉片见证了新时期藏医妇产科的发展与变迁。

“我从小就想当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拉片出生于日喀则市江孜县，父母是供销社职工。1990年高中毕业时，她最初报考的是西医，但后来被录取到了西藏自治区藏医学院。

“本来我对藏医并不是很了解，收到通知书时还有点惊讶。”当时拉片对这一古老文化仅有的一点印象，就是母亲常年的胃病因服用一剂“坐珠达西”而愈。

现代化的校园，5年的专业学习，让拉片对藏医药药了不了解到热爱，并成了她终生的事业。“学校里有高楼，有现代化设施，环境优雅，老师们和蔼可亲，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入学不久，强巴杰烈院长就亲自给我们讲藏医药的历史，讲医德医风，让我感觉自己很幸运。”

“当时我们班30个人，10个女生，20个男生，大家一起努力学习，晚上有时甚至到路灯下看书，寒暑假也在背诵经典，时间过得太快了。”学院传授的内容，从理论到实践，从诊断到治疗，甚至草药识别、天文历算都要涉及，此外还包括西医，让拉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大学毕业后，拉片被分配到自治区藏医院妇产科，一干就是21年。她跟着老师写病历、查房开始，到单独值班、做一些简单的手术，再到积累大量临床经验，直到今年获评主任医师，成长为学科带头人、妇产科专家。

“藏医妇产科有四十类疾病，其中关于内分泌的是最多的。如何把疾病准确分类、诊断，让藏医的诊疗更有特色，疗效更高，这是我目前想得最多的事情。”她说。

作为藏医药的继承者，深感责任重大

作为古老藏医药的继承者，拉片深感肩上责任重大：“藏医药理论博大精深，内容丰富、体系完备，学校教育也做得很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掘、保护一些濒临失传的传统疗法，探索与现代医学的结合，让藏医药的疗效更高，获益的人更多。”

她举例说：“医典里有病例，提到的治疗方法有舌诊、尿诊、脉诊、问诊等手段，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介入现代医学手段，进行更详细的检测，通过数据的支撑，来提高藏医疗效。”

藏医里还有一些特殊的诊疗手段，如脉泻疗法、放血疗法、火灸疗法、宫泻疗法等，拉片和同事们也在想办法恢复。关于其中的脉泻疗法，他们多次请索县藏医院的一位老专家传授技艺，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上，妇产科30多位医护人员都能熟练操作。

“单说疗法，我们在临床上用的，占医典里总数的五分之一都不到。关于方剂，医典里有上万个，我们目前用的也就200多种。”拉片介绍，他们一方面请老藏医、民间藏医传授传统疗法，一方面积极研发新的制剂，目前已经研发出30多个。

拉片和同事们也在积极推进藏医标准化和藏西医结合。“疾病分类，诊疗程序，检测方式，这些都要有标准，没有标准就没法走向世界。还有就是要有介入西医，比如剖腹产的处置、输血等。藏医不是万能的，必须做到与时俱进。”拉片说。

标准的普通话，清秀的面庞，温文尔雅，不穿白大褂的拉片，给人的感觉是一位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我们学藏医，首先要学医德医风，这是一门独立的课。”拉片治愈的病人，很多都和她成了朋友。那曲的一位病人，曾因流产住院治疗，出院后怀上了第三胎，有什么异常随时打电话咨询拉片，而拉片也是有求必应，四五年来一直保持联系。

多年的出诊行医，让拉片很有成就感。“以前我看到产科的大夫，就觉得他们的工作很神圣，现在依然这样认为。在这个岗位上，我能踏踏实实地为别人做点事。”

越来越多女性投身藏医藏药事业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藏医医生大多数为僧人或是男性，很少有女性行医，甚至形成“妇女学习藏医不对”的观念。

如今，在西藏各地的藏医院里，都有像拉片一样的女藏医。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藏医藏药事业中，她们当中有藏医药女硕士、女博士，甚至博士后。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常务副院长益西央宗说，全院目前有800多名医护人员，女藏医、护士占到一半以上，而且越来越多。西藏自治区藏医学院每年招收的学生中，也有近一半是女生。

新华社拉萨电

物理学家薛其坤被称作“离诺奖最近”的院士，日前又获首届未来科学大奖

盛誉之下，仍然静作量子王国垂钓者

以与时间赛跑为乐的物理学家薛其坤，是守望量子世界十余年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发现者。他深知肩上沉甸甸的使命——科学发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只有争分夺秒、没有退路。

对于量子霍尔效应，薛其坤打了一个比方：普通状态下的电子运动轨迹是无序的，时有碰撞。量子霍尔效应里的电子在外加磁场的情况下，运动在“高速公路”上，分道行驶。而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中，无需在材料中加外磁场，即可实现电子的“分道行驶”。



▲薛其坤近照。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本报记者张漫子

9月19日，首届未来科学大奖的“物质科学奖”花落物理学家薛其坤身上。这位早在2013年被称作“离诺奖最近”的中科院院士，是守望量子世界十余年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发现者。

现场连线环节，得知获奖的薛其坤在电话另一端颇感意外。

“很突然，非常感谢……高温超导研究是固体物理学的难题之一，希望继续走下去。我一定好好努力。”

言语间，一个谦逊质朴、不乏真诚的科学家形象赢得满堂喝彩。面对业内赞誉，他希望更多的机会和荣誉能够垂青年轻人。

自1999年回国以来，潜心超导研究的薛其坤刻意回避进入公众视野。终于，2013年4月9日，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发布会上，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赞誉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的评价方让更多人明白这项成果的分量：

“这是从中国的实验室里头，第一次做出并发表出的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鲜花和盛誉未曾改变薛其坤的科研轨迹。如今，53岁的他还是继续泡在实验室里，继续与时间赛跑，继续做一名科学“匠人”。

实验室里与时间赛跑的人

对于多数人来说，量子世界像一座未被探索过的山脉。想进入这个世界、与其对话，就好比与一个遥远星系的外星文明取得联系。

对于一个以探索为乐的科学家来说，搞科研则像侦探小说，下一个发现在哪里，几乎是变幻莫测。

量子世界的未抵之境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薛其坤。大概所有认识他人都知道他“7-11”式的生活轨迹。“早上7点进实验室，晚上11点才离开，这样的作息时间，其坤已经坚持了20多年。”清华大学物理学系原主任朱邦芬院士说。

这是薛其坤从日本求学时就养成的习惯。学生们亲切称他为“7-11”，也曾心里

较劲，“想和薛老师比比，看谁先到实验室、谁最后离开”，然多年来几乎无人能赢。这种近乎苦行僧的日常“修炼”，却是薛其坤获得快乐的源泉。

揭开谜底的每一步都充满惊喜。“当你的实验数据比别人准确、漂亮，那种快乐可以体会吗？当一个复杂庞大的仪器被驾驭得如同骑自行车一样娴熟，那种自如可以感受吗？当一项研究取得一再突破，那种骄傲可以想象吗？”薛其坤向记者兴奋地描述这样一种发现中的忘我、忘我中的快乐。

以与时间赛跑为乐的薛其坤也深知肩上沉甸甸的使命——科学发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只有争分夺秒、没有退路。

“以每50小时完成一个特定条件下的实验计算，则每年可完成100个不同条件下的实验，日积月累，坚持不懈，你一定在领域前列。”回国后的他，没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假期和周末，每年平均工作时间在330天以上，每天工作时间在15个小时左右，年平均工作时间高达5000小时。

只要不出差，不管多晚，薛其坤每天总要到实验室看一看，同学生们聊一聊。“那种对科研的投入和热忱，真是让人惊叹。”加入“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实验团队不久，清华大学物理系博士生冯峭就被薛其坤的刻苦精神深深感染，“一开始还觉得这科研时间表很累很枯燥，可在薛老师的影响下，每观测到一个漂亮的数据，就获得无以言表的满足，也便自觉加入到与时间赛跑的行列中。”

量子王国的垂钓者

在诸多科技强国争夺学术话语权的当下，创新是极其重要的稀缺资源。正因如此，在不少国内外同行致力于“增量创新”的同时，薛其坤关心的是富有挑战的、更逼近原始的颠覆性发现。

2012年10月的一个晚上，薛其坤收到学生短信，称他们的实验中观察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迹象。

来不及放下手机的薛其坤立即组织起团队成员，设计实验方案、部署实验细节，马上投入到检测实验的实施步骤中。

接下来几天的实验中，团队成员们用“诚惶诚恐”形容当时的心情。25800欧姆，这是一个所有人期待的标志性数值。进入最后环节，数据不停地跳动着，10000、20000、25800，数据停住了！

材料在零磁场中的反常霍尔电阻达到量子电阻($h/e^2 \sim 25800$ 欧姆)的数值，并形成一个平台，同时纵向电阻急剧降低并趋近于零，这是量子化反常霍尔效应的特征性行为。

世界量子物理学将记住这一刻——在美国物理学家霍尔于1880年发现反常霍尔效应133年后，人类终于实现了其量子化。

实验结果干净漂亮，数据完美得不可思议，每位成员都在由衷地感叹：“这真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结果揭晓当天，薛其坤带了两瓶香槟，去实验室里找团队成员们合影，想要定格这个珍贵的瞬间。这天，离2008年10月实验开始已过去整整4年。

对于量子霍尔效应，薛其坤打了一个巧妙的比方：普通状态下的电子运动轨迹是无序的，时有碰撞。量子霍尔效应里的电子在外加磁场的情况下，运动在“高速公路”上，分道行驶。

而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中，无需在材料中加外磁场，即可实现电子的“分道行驶”，这解决了外加磁场在实际应用中“价格昂贵”“体积庞大”“不适于便携式电子设备”这一难题。

薛其坤介绍，拓扑绝缘体上实现反常量子霍尔效应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华裔科学家张首晟等人于2008年首次提出。然而现实中，能够制出满足实验需求的拓扑绝缘体材料绝非易事。

薛其坤及其团队却不计困难有几重、成功有几成，不由分说担起使命，就这样潜入了甚为陌生的“量子王国”。

一开始，他们沿国际上惯用的技术路线进行尝试，结果总是失败。渐渐地，他们开始探索用不同元素和结构来生长材料。1000个样品，一次次生长、测量，一次次不顺利、调整，再生长、再测量……

薛其坤和他的团队如同耐心静默且技艺精湛的一行垂钓者，守望着池塘中的每一丝

收获。终于，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成果接踵而至：

2010年，完成对1纳米到6纳米厚度薄膜的生长和运输测量。

2011年，实现对拓扑绝缘体能带结构的精密调控，使其成为真正的绝缘体，并去除了体内电子对输运性质的影响。

2011年底，他们在准二维、体绝缘的拓扑绝缘体中实现了自发长程铁磁性，并利用外加栅极电压对其电子结构进行了原位精密调控。

“科学就是科学，就是要循序渐进，来得不得半点马虎。”薛其坤说。

走向不惑，理性的科学“匠人”

薛其坤身上，一种很典型的气质是理性。搞科研，他秉持这种理性一步步逼近真理，实现对科学“极致”的追求。

除了创新的理性之外，身为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他，还兼具育人的理性。他懂得给予青年人科研发展的自由之路以充分的尊重和鼓励。

在一次题为“走向不惑”的演讲中，他将自己拉下“神坛”，向学生们主动讲起自己求学初期那段并不平坦的人生体验：考了三次才考上的研究生，7年时间才拿到的博士学位，在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留学的八年时间里，更要面对每天加班到深夜的严酷考验……

台下有不少学生被这段诙谐的讲述逗乐，不少科研的“挫败者”重拾起勇气。

“好人”，是薛其坤的学生对他最质朴、真挚的评价。即便是在成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之后“白天处理事务、晚上心系科研”的忙碌日子里，他始终保持着与学生们研讨的习惯。“不管在哪里见到他，他都会先向你笑——那样咧着嘴、高兴到心里的笑，感染着我们每个人。”他的学生告诉记者。

学生们还说，薛其坤乐观、幽默、有活力，时常买好吃的“贿赂”他们，但遇到与实验技术、科研训练有关的事，薛老师要求却近乎苛刻。

写报告，哪怕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他都会挑出来；操作仪器，是按顺时针还是逆时针，他都要求学生从细微之处养成习惯。他常说，“练好童子功”，这样当科研机会来了，你才能抓住它。”

多年的科研经历令薛其坤深谙科学发现的“武林秘籍”。他叮嘱学生们不要仅盯着今天发篇好文章、明天找个好工作，要真正把某个感兴趣的科学命题搞清楚，完成从科研执行者到指挥策划者的“蜕变”。

他的理性还体现在对年轻科学家的关照中。不论是领奖致辞，还是论坛演讲，他不止一次呼吁科学界，把更多的鼓励和荣誉让给年轻人，“他们是科研界的未来，科学界的希望”。

遇好事，薛其坤的习惯是“往后缩”，却把年轻人推到前方去。也正因此如此，“他总能凝聚到顶级的合作力量，将团队中每个人的作用发挥到最佳。”朱邦芬院士这样评价他。

如今的薛其坤，依旧以“匠人”的身份，跻身于科研的第一线。

他的心中好像有一条停不下来的“跑道”：研究的起步阶段，得跟在巨人身后跑，然后你努力，逐步缩小差距；随着科研上渐有起色，再遇上一丝运气，也便有了同行较量的机会；比肩前行的时候，继续发力，而后超越对手；也只有砥砺前行，经历过酸痛，才能成为最终的领航者。

他也希冀，未来能有更多富有才华的年轻人接过“奔跑”的接力棒，在科学的“旷野”中发现更多迷人的风景。

“是庆幸我，在先烈挥就此卷，取义成仁百载之际，冥冥中安排它完好的飘零至香港、当年同盟设在跑马地黄泥涌四方支部一箭之遥的寒斋，由在下履藏珍护。”文中，许礼平这样动情地写道。

有“香江潜龙”之誉的潘静安，是抗战时期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领导人，被周恩来倚为股肱之才，他在香港各界广结善缘，为统战工作作出过杰出贡献，而毕生两袖清风。

潘静安同时也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共产党人，诗、书、篆刻，样样精通。许礼平收有潘静安所写的精雅行书长卷，衷心钦佩有这样风范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半年中奋笔为潘静安写下两篇长文，以期“发潜德之幽光”。

“潘静安是稀有品种”，但关于他，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记录，这引起我探索其生平的兴趣。”许礼平说。

还有翟曜晖、黄祖雄、吴荻舟等，都是昔日香江的风云共产党人，他们深藏功名，隐匿在历史的凤烟中，许礼平通过自己的收藏与一支健笔，让他们走到前台。

人们注意到，许礼平的兴趣之一，是将一代有很高文化修养、清廉自守的共产党人记录下来。他希望，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不要风流云散。

他说，他的风云系列，还有长长的文字要写。

新华社香港电

许礼平：在香港江打捞“旧日风云”

透过世界金融与贸易中心这些熟悉的标签，看到香港城市性格的另一面——她同时也是一座对文化怀有温情与敬意的城市。

类似于中国现代历史上文人办报的传统，香江这些超小型出版机构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其创办者或是有深厚学术背景的学人，或是著作等身的作家。

例如，经济学家张五常创办了花千树出版社，有香港传播学之父之称的余也鲁创办了海天书楼，作家东瑞夫夫妇创办了获益出版社……它们以多元的图书产品，对文化的素心坚守，刷新着人们对于香港的刻板印象。

坐落于铜锣湾希慎道上的翰宫大厦内的翰墨轩，也是一家典型的迷你型出版机构。其创办者许礼平，以书画收藏与鉴赏闻名于业内，同时，也以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的钩沉，为近年海峡两岸及香港的文化界所瞩目。

许礼平1952年出生于澳门，早岁师从著名学者周庚，后留学日本，期间编纂《货币书目知见录》《中国语文索引》二书，上世纪70年代供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有《中国语文研究》，80年代创办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

去年，内地学术文化图书出版界知名品牌三联书店出版了许礼平的《旧日风云》一书，颇受学术界与爱书人关注。

近日，记者在翰墨轩采访了许礼平。

翰宫大厦二楼的一角，就是翰墨轩。百余平方米的空间内，四壁水墨淋漓，尽皆是出诸

由于香港有不少“迷你型”出版机构，才使人透过世界金融与贸易中心这些熟悉的标签，看到香港城市性格的另一面——她同时也是一座对文化怀有温情与敬意的城市。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救亡图存的志士仁人，对文化积累有大贡献的学人，他们的书画，不似书画大师们的作品那般抢手，但却是许礼平悉心收罗的对象。

新华社记者张修智

国际化大都会的香港，有不少“迷你型”出版机构。

这些规模极小的出版机构，或隐藏在废弃的工业大厦里，或栖身于闹市的商住楼中，通常占地面积不大，员工不过十人上下，有的甚至是“夫妻店”。

然而，正是这些迷你型的出版机构，让人